

基於管理視閥的學術期刊 區域體制改革思考

姚曉南

當代中國任何政府層面的改革，某種意義上，首先是出於管理的需要。即使是因外力而引起的改革，也常常是為了維護管理的權威或效能而不得不為之。在一個幾乎無所不納入管理的體制下，學術發展也必須遵循這一規則，任何期望以學術內在規律來制定改革發展路徑的意圖，是難以實現的。學術期刊改革發展同樣面臨這個規則的制約。近年關於學術期刊改革發展，論述最為深入的兩篇文章，當數仲偉民的《緣於體制：社科期刊十個被顛倒的關係》、朱劍的《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他們不約而同談到：造成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面臨的艱難生存局面、學術共同體無法成為學術生產傳播秩序構建主體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權力的強勢地位所致；學術期刊與二次文獻期刊、評價機構、期刊數據庫，以及與作者、讀者和政府管理部門等各方面的關係被扭曲甚至顛倒，最終都會歸結到現行學術期刊體制。從管理理論視角考察這些現象，實際是政府與學術共同體、與市場的博弈所形成的扭曲狀態。

應該看到，無論期刊界在數字化時代來臨、新媒體衝擊下如何焦慮，如何思變，表面看與世界技術創新密切相關，但近年來報刊體制改革、媒體融合的真正推手，最終是來自行政管理層面。以高校為辦刊主體的學術期刊，主管權力主要在國家或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具體學術業務目標的制定在主辦高校。主管單位和主辦單位，均為政府或準政府機構。學術傳播新秩序的建立、學術期刊改革藍圖的設計，無論多麼理想，都無法繞開來自管理的規制。其中，政治正確的要求、科研發展目標與評價的引導、行政調配的力量、辦刊資金的來源等，都是改革方案設計需要考慮的因素。正是從管理的角度，筆者以為，在考慮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學術期刊運行的底層設計之時，可以跳出傳統由政府或市場“單中心”的管理方式，探索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管理，建立學術期刊區域發展改革管理模式。

一、管理：看得見的手

有關對期刊管理體制弊端的討論與批評，已經汗牛充棟。但在現行體制下，這些討論與批評只停留在學術層面，而諸如刊號管制等基本的管理體制並沒有根本改變。在可見的將來，即使新媒體主辦主體能夠明晰，但實現自由生長與擴張的可能性很小。無論學術發展的需要如何迫切，已有的學術期刊主辦單位由體制內變更為體制外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至於學術期刊的內容生產，基本政治標準的遵循則根本不存在討論空間。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管理理論所主張的“看得見的手”——政府以“強勢”的身份進入公共事務管理領域，在學術期刊體制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1. 來自管理主體而非學術共同體的科研評價體系

對國際檢索系統 SSCI、SCI 等的崇拜，始作俑者不是學者群體，而是來自國家的意志。《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曾將發表國際論文（SCI/SSCI 等收錄期刊）及其被引頻次列入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具體目標為：“到 2015 年國際科學論文總量由世界第 5 位上升到第 2 位，被引用次數由世界第 13 位上升到第 8 位”。在這個指揮棒下，國際論文成為了中國學者學術影響力評價和學術地位認定的重要考核指標，也是高校及科研機構發展實力的重要衡量標準。由此延及國內的 CSSCI、各類核心期刊，異化為期刊評價的工具，就不足為奇了。

在學界對期刊評價弊端批判聲日隆的今天，新近頒佈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描繪的“科技創新發展新藍圖”中，仍然把“國際科技論文被引次數達到世界第二”作為自主創新能力全面提升的發展目標之一。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指出：“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誌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誌，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誌訂閱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閱；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於倒貼為西方服務，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這裡批評的雖然主要是科技論文的寫作與發表，但在導向上，對人文社科研究的影響並無二致。

在我國，科研管理體制與學術評價機制是共生共存的，二者改革必須同步進行，是學術界、期刊界的共識。2015 年以來，有關科技體制改革、科研評價體系改革、教師評價體系改革的系列指導性文件紛紛出台。這些文件，一定程度上順應了國際國內學術發展的形勢和學術界要求改革的長期呼聲，部分吸納了集中度較高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些文件主要想解決的問題，總體聚焦為盡快提高我國的科技創新水平，目的是要努力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要重在促進人文社科成果為政策諮詢、智庫建設服務，要培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研究這些管理文件，我們發現，在基礎研究方面，政策新意並不多。管理層急功近利的意圖一目了然。

教育部 2016 年 8 月發佈的《教育部關於深化高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關於完善科研評價導向的內容，歸納幾個關鍵詞，主要是“服務國家需求”、“注重實際貢獻”、“代表性成果”、“創新性”及“顯示度”高的成果等。從管理的角度理解，即將實行的高校教師考核評價衡量標準，無非是經濟社會效益和高顯示度成果。對於教師而言，評價的壓力可能有增無減：科研工作要麼能取得經濟效益，要麼能獲得政府採用或官員青睞，要麼必須在國際國內頂級期刊或權威期刊發表研究成果。具體到每一所高等學校的管理手段，在此文件精神導引下，極大的可能是實行更加嚴峻的量化管理。這種無法擺脫的變相量化科研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辦刊的導向性影響，對學術期刊的評價，不言而喻，難以起到改革的真正促進作用。由此觀之，學術期刊業內改革設計者設想的數字化成功融合背景下，編輯、學科專家、讀者完美結合的理想狀態，究竟能否真正發揮評價作用，難免留下懸疑。可以推想，在來自於政府的科研學術評價改革方針已定的情況下，對學術共同體在這方面能起的作用，難以抱太大希望。

2. 來自管理主體而非期刊人的改革

期刊管理體制的慣性下，學術期刊人本來是衣食無憂。仿佛突然之間，互聯網、數字化浪潮的襲來，驚醒了學術期刊人好夢。在沒有任何應對措施的情況下，全國大部分學術期刊逐漸把自己生產內容的傳播權，幾乎以白送的方式轉給了商業性的期刊數據庫。隨著網絡的普及和新媒體的出現，學術期刊讀者的閱讀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改變，學術期刊面臨著諸如“數量過多、規模過小、資源分散、結構不合理、市場競爭力弱”、“千刊一面”等激烈的批評，自身的生存危機感

與日俱增。雖然以部屬高校為首的“學術名刊”帶頭發起了自身改革的行動，如建設“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提出“紙質學術期刊與數字化學術期刊分開”、“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發行分開”的兩分開數字化學術期刊體系構想，並取得了初步的成績。但在體制的框架下，絕大多數學術期刊，無力自行改革。即使是“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至今也未取得獨立主體的名分。

真正的改革還是來自政府管理的意志。201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2012年7月，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發佈《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揭開了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報刊體制的改革大幕。雖然這個“意見”和“實施辦法”最後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對乃至抵制中，不了了之，但其改革的思路令人深思。無疑，來自管理層的改革，就如上述科研學術評價體系一樣，着眼的未必是學術期刊內在發展的科學性合理性，而是政府的政治目標和經濟或社會效益目標。至於改革可能帶來的學術期刊是發展還是衰退、學術期刊人的生存境況問題，不在考慮之列。對此，學術期刊人對改革的期待和對改革進行專業設計時，應該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年2月，教育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見》；2015年3月31日，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聯合發佈了《關於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可以看到，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組舉行專門會議，提出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政府工作報告》又專門提及媒體融合問題，強調了媒體融合在整個傳媒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是推進我國傳媒業改革發展的重大舉措，促進媒體融合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由此可以設想，為了實現國家戰略，以往體制對學術期刊的制約，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改觀。對於學術期刊而言，這批文件真正涉及了改革的一些本質問題，特別是給以學報為主體的高校學術期刊，提供了改革轉型的空間。

二、學術期刊區域體制改革的可能

西方學術期刊媒體融合遠遠走在了我國的前面。以期刊大國美國為例，三萬餘種期刊，大都在原來紙本刊的基礎上，實現了網絡化和新媒體化，且大多通過網站閱讀或移動媒體閱讀，獲得甚至超過紙本期刊的收入。由此帶來的期刊文章發表時滯的縮短、為讀者和研究者多樣性的服務，更是傳統期刊不可比擬。國際期刊發展形勢，成為促使我國期刊管理體制改革和期刊媒體融合的外部倒逼因素。

反觀中國的學術期刊，特別是高校主辦的學報及其他學術期刊，由於前述辦刊主體的特性，某一期刊單獨或某一高校若干期刊組合進行市場化改革或媒體融合轉型，限於規模、成本和技術，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以中國這樣一個近14億人口、數千本學術期刊且分散在數千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狀況，如果依託某一或某幾家壟斷性的數據庫實現數字化融合轉型，造成的期刊產品產權問題可能是災難性的；如果寄希望於仿效西方報刊集團的期刊數字化轉型和媒體融合，實現政府改革文件期待的市場化效益，同樣不可思議。

根據如前分析，我國的學術期刊由於體制的限制，對其管理本質上屬於公共事物的管理。近年來的政府有關改革文件中，凸顯的是政府希望以“看得見的手”，促使學術期刊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實現學術與經濟的雙效益；希望學術期刊通過市場化改革，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在此，本來是針鋒相對的市場派和政府派管理理論，在政府的改革期待裡，成為一種悖論性的融

合指向。至於市場管理和政府管理在學術期刊改革中可能的失靈，並不在上述文件考慮之列。

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見》，對高校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給出了明確的意見：“推動符合高校實際的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探索建立期刊編輯部分散組稿審稿、出版企業統一出版發行的運營模式。”同時，對高校學術期刊的媒體融合，指示應該“努力實現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優勢互補、一體發展……推動從單一產品形態向多媒體、複合出版產品形態，從產品提供商向內容服務提供商的轉型升級。依託優質學術資源或優勢出版平台，構建統一的學術期刊數字化平台，推動學術期刊數字化升級”。更為重要的是：“鼓勵同類型、同地區的出版單位開展聯盟合作，共享出版資源和渠道資源，形成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優勢出版群。”這裡，管理層從體制、市場、技術諸方面，對高校學術期刊的集約化、數字化轉型與媒體融合，在管理體制機制方面給予了改革的騰挪空間。

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夫婦創立的“多中心”管理理論，是鑒於市場或政府在公共事物的管理過程中失靈，而提出公共事物的管理，應該擺脫市場或政府“單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管理模式，從而可以克服單一依靠市場或政府的弊端。（奧斯特羅姆、帕克斯、惠特克：《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宋全喜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這一理論，對於以學報為主體的高校學術期刊，進行區域性集約化、數字化轉型與媒體融合改革，提供了理論參考。

在政府主導下，同類型、同地區的高校學術期刊，以現有的行業學術團體為社會組織結構（建立聯盟），依託相關出版企業（如高校出版集團平台），進行區域管理體制改革轉型，具有現實可行性。以一個省為例，省內大多數高校的投資主體是省政府，少部分是市級政府（民辦高校鮮有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在財政上，即使是市屬高校，也能獲得省財政的部分補貼。從經濟的角度觀之，一個省的教育主管部門，猶如西方一個大型報刊集團，實際是省內大多數高校的投資主體，握有高校學術期刊的財政權。在管理權限上，省內所有高校的期刊，主管部門都是教育廳或高教廳。在集約化意義上，學術期刊投資主體和辦刊主體是明晰的。因此，以一個省為區域，進行省屬高校的學術期刊聯盟合作，進行集約化、專業化轉型，進行綜合刊向專業刊的調整改革，體制的牢籠可望打破。各個高校各自為政，死守一塊期刊自留地而不思變革的行為，也很容易解構。在這裡，政府（學術期刊管理和投資部門）、市場（區域大型出版企業）、社會（學術期刊聯盟）形成了一個三維管理框架，既克服了單一刊物或單一高校期刊小而弱的缺陷，又可保全政府有效管理下的期刊辦刊自主權，更使學術共同體對學術評價有了行使權力的空間。

上述三維管理框架，解決了諸多改革難題。如辦刊主體的確認，是期刊改革研究中甚感頭疼的難題。而以省級區域進行改革，全省高校學術期刊聯盟合作，由於聯盟單位同處一個省域之內，省內的報刊管理部門不存在跨域管理的為難。這個現行體制下最頭痛的問題也不復存在；從經濟上考量，聯盟建立後的集約成本，肯定低於現行的一校一刊（學報）或一校多刊的分散辦刊成本；從技術上考量，一所學校如果為本校學術期刊進行網絡化、媒體融合建設，除了經濟成本之外，技術障礙難以克服、效益目標難以實現。而以一省之力，解決相關技術問題，則沒有困難。以廣東省為例，全省常駐人口接近一億，擁有130多所高校，其主辦的學術期刊約150種（包括學報近100種）。以這種區域刊物體量，以及管理上、投資上的優勢，在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導引下，建立全省學術期刊聯盟，進行集約化、專業化改革轉型，實現媒體融合，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作者係《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主編、教授）

〔責任編輯 劉澤生〕